

读《实践论》《矛盾论》之四
辩证法也是认识论

■孙正聿

《实践论》《矛盾论》的认识论的理论性质与辩证法的理论内容的统一，不仅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而且特别是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哲学思想。

“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列宁在他的“辩证法”名著《哲学笔记》中作出的最为重要的论断。这个论断，不只是表达了列宁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理解，而且是直接地继承并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理解。

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正是在这个“宝贵文件”中，马克思以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为切入点，逐条深入地阐述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明确地提出必须“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并因此得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根本性结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观点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能动的反映论。这集中地、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理论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理解是深刻一致的：第一，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内容”方面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都从认识论上把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归结为直观的反映论；第二，马克思批评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唯心主义“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都从认识论上把唯心主义归结为抽象的能动性；第三，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根源在于离开“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这正是恩格斯所指认的离开“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都从认识论上把旧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不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辩证法”决不是离开“认识论”的孤立的“方法论”，而是构成“能动的反映论”的理论思维。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评，都是立足于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认识论”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恩格斯不仅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这就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这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的前提”。批判地反思这个“前提”，阐明“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世界”的辩证关系，是认识论的根本任务，也是哲学的根本任务；辩证法是认识论的根本内容，认识论是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因此，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由此可见，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断，直接地继承并合理地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命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论断，而是列宁在研读哲学史、特别是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探索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以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对于这个基本结论，列宁强调地指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并且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毛泽东则不仅“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深刻地阐发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实践论》《矛盾论》多处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其中，引证最多的是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这表明，毛泽东是在认真研读列宁的上述著作并深入阐发列宁的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矛盾论》提出的主要的理论任务，是“引伸和发挥”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所阐发的哲学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这表明，能否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不仅取决于对这两部著作本身的理解，而且深层地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只有理解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真正理解《实践论》《矛盾论》是认识论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的认识论。——选自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

《豆腐问题》《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等文章则对我们印象中的“悠久历史”加以阐释。豆腐并非淮南王发明，这个讹传是朱熹在《咏素斋》诗歌中自注，翻遍宋代以前的典籍，都没有淮南王创制豆腐的明确记载。但这个说法在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中却不断肯定，因此孙机费了一番力查证说明，破解这个传说的不实。茶的情况和豆腐类似，也只是假托神农发现，溯根追源，梳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这一条“茶之路”上走过许多伟岸的身影，但它的源头的确不可考了，或许就是布衣百姓劳作时的偶然发现，而我们现在要克服这种攀附名望的习惯。

《从历史中醒来》全书总共五十篇，大半皆是正本清源、纵横捭阖的质疑之作。每件器物，都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每个传说，都透露着历史的线索。器物属于过去的时代，它的内容、意义以及身处的生活环境需要得到解释，它所内涵的文化密码需要学者们的可靠解析。

临摹出一幅以党章为核心、法规为主干、规章为分支，位阶明晰、等级有序、完备统一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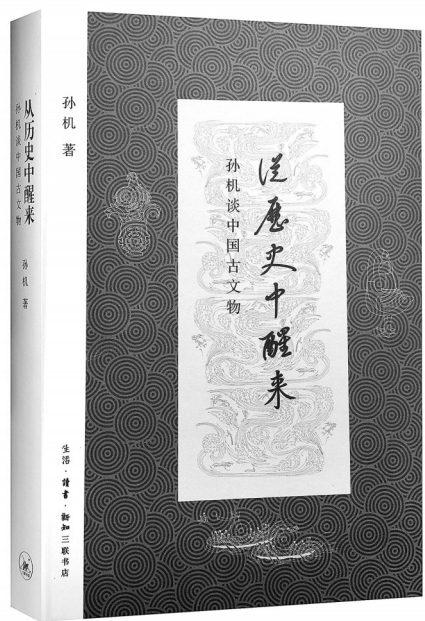
意义还不止于此，党内法规制度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学说、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学术对象和研究领域，本书实际上试图融合有关党内法规制度研究的多元路径和方法，形成以成为党的建设学说、政治学、法学研究的诸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门类。当然，一门成熟的学问和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一个由核心范畴、基本范畴、重要范畴组成的概念体系，一套能够阐释法规建设学理的理论体系，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法论，一批代表性理论研究成果。期待包括斌雄教授在内的各位从事党内法规制度研究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砥砺前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成果！

（作者系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研究员）

在古物里读懂中国

——读《从历史中醒来》

■林颀



利了不知多少倍，艺术设计要求忠于历史，然则荧屏上常见各种捏造纛漏，而学术界也常浮夸成风，这大约是孙机“呛声”之缘由吧。比如，《诸葛亮拿的是“羽扇”吗？》。说到诸葛亮，人们头脑中就会浮现谈笑风生、羽扇轻摇的形象。甚至把“摇羽毛扇的”作为了谋士或智囊的代名词。这种刻板印象以讹传讹，其实是一种误解。孙机与我们细语分说，穷究追底，原来诸葛亮拿的应该是麈尾。这其中还包含了魏晋“摩挲”的清谈风尚，文化寓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同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温润平和的气质，孙机在《从历史中醒来》里时露峥嵘，甚或咄咄斥责。即便读书大家邓云乡，孙机也有所批评。《红楼梦》第五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说：“贾母歪在榻上，和众人说笑一回，又取出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邓云乡说这里有个问题，“试想，贾母年纪大了，眼镜匣子所装，自然是老花镜”，而“老花镜是看近不看远的”。孙机对“试想”“自然”这类揣测的用语，对今人仅从想象出发而妄议的行为表示不满。他在《中国早期的眼镜》这篇文章里搜集了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眼镜的流行程度很高，雍正和乾隆就都配有很多眼镜，富家老人往往备有老花镜和近视眼镜若干，在不同场合替换使用乃是常事。

很多影视剧让人觉得太假，大概跟细节不到位有关。一部好的历史剧，肯定要在搭配的器物上花心思。1987版的《红楼梦》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考证工夫到位。曹雪芹写王熙凤出场时的打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官绦，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约裙。”这身装扮尽显“凤辣子”的本色，很好地剧中得到了还原。每位演员的衣着、妆容、配饰，乃至小到捏在手心里的手绢儿，都要细加考量，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从细节做起，才可以把观众带入氛围，真正融入到影视剧身处的场景。

器物的本质是内化了的历史。大体说来，一种器物的形态表现，或可看做生物的演变，形态的变异是随着器物的年岁依次显露出来的，把历史推进的轨道与器物变化的痕迹——两者相依的关联，明晰系统地揭示出来，实在是古器物学

家很好的中心课题。器物本身包含着其中的相关观念。对于一件器物，尽量占有已知的事实，能把它的原始说出来，通过对器物本身的认识寻找它的解读方式，对于这一器物以及历史，才能拥有较全面的了解。

我们所追求的器物学，并非只强调物质本身，尤其对于史前史，能够反映远古时代光芒的证据，不仅是考古获得的各种实物证据，还要算上依附在这些器物上的神话和传说。孙机以他的博闻强识，仔细考证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貔、猎豹、金丝猴等形象，还辨析了长颈鹿与麒麟的异同，以及三足鸟的传说为何出炉，这是饶有趣味的古生态场景还原，这也证实了神话的转化源于对现实的刻意化解。中国神话史的一大研究目的，就是尽量分析出神话的本来面貌，还中国文化传统以清流溯源。

神话对于原始社会来说，是世界观和现实观的基础，为历史演变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基础。关于历史向神话、经历向记忆的转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鸞鸟、神面与少昊》一文。根据孙机引经据典的分析，图腾制度不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普遍存在，也不是为稳定族外对婚制而建立起的制度。孙机认为，中国古代无须通过图腾制也能理顺婚姻关系。不过，在婚姻制度之外，比如社群阶层等方面，图腾信仰是否形成了制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需要文物学家的进一步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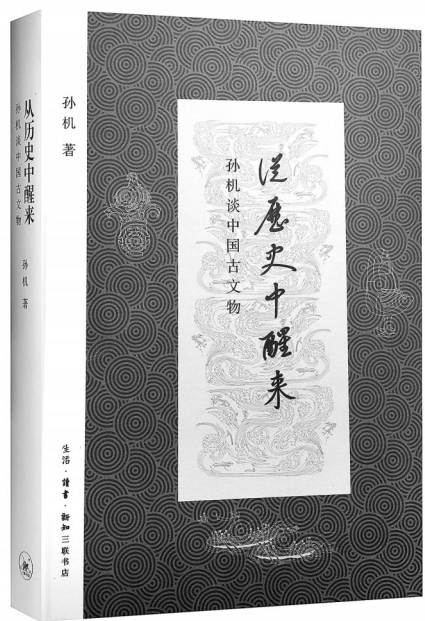
《豆腐问题》《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等文章则对我们印象中的“悠久历史”加以阐释。豆腐并非淮南王发明，这个讹传是朱熹在《咏素斋》诗歌中自注，翻遍宋代以前的典籍，都没有淮南王创制豆腐的明确记载。但这个说法在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中却不断肯定，因此孙机费了一番力查证说明，破解这个传说的不实。茶的情况和豆腐类似，也只是假托神农发现，溯根追源，梳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这一条“茶之路”上走过许多伟岸的身影，但它的源头的确不可考了，或许就是布衣百姓劳作时的偶然发现，而我们现在要克服这种攀附名望的习惯。

干部书架

在古物里读懂中国

——读《从历史中醒来》

■林颀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的古代历史。这就要求考古学必须是一门严谨求实的学科，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还要以各种手段对这些材料辨伪存真，尽可能地还原人类古代社会的本来面目。

现代的考古学强调田野调查，是20世纪初从西方输入的，它的前身是传统的古器物学。宋代金石学家吕大临论古器物学之目标，曰：“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此语于今亦足取。考古学家李济曾转引吕大临的这句话，将中国近千年停滞不前的古器物学归因为没有做到这三点，由于传统秉持的文物赏玩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盖了“了解”，理性的不足带来的后果，就好比一座地基不牢的建筑物，很难持久地站立。

以前贤之言观照，我们大概能理解博物大家孙机一直以来致力于普及物质文化研究之意旨。“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五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本国情，本应成为常识，本宜家喻户晓。”孙机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时如是说道。常识之缺，不仅未能家喻户晓，就是连学者、专家也多有不明之处。孙机的《从历史中醒来》是他近年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相比《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学术性更强，目的正是为了打好古器物学的地基，经多方综合比较，尽可能详细周密地校勘，对古器物原始材料做了一番有价值的重新审视。

古代物质文化范围很广，问题很多，千头万绪，难以细说。断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可以说是器物学家最需要用力的工作。孙机在掌握传世书籍资料、出土文物资料以及域外资料的基础之上，纵横比较，详加分析，尤其注意考证具体器物中透露的年代特征。现在的造假水平太高，科技手段未必能证明它的真身，人的学识素养和判断力很重要。

比如，《关于一支‘唐’鍍牙尺》。这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它发表在初版的《中国古度量衡图集》上时，定名为“唐鸟兽花卉纹黄牙鍍牙尺”。该藏品纹饰的题材和图案的布局和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鍍牙尺相近。孙机对此尺之唐代认定打了引号，表明了他的怀疑态度。孙机认为，此尺纹饰模糊，笔力不贯，凤、狮、鹿、鹤等鸟兽刻纹形象羸弱，不符合唐代官制工艺品的水准。那个鸟头兽身四足双翼的怪物在唐代文物中从未出现过，和吉

党内法规制度研究的三个维度

——评《扎紧制度的笼子》

■袁荣

党的建设与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可以说是一条历史规律，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党管党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关于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尤其是揭示党内法规制度发展之历史规律，总结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宝贵经验的研究，是事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亟须一批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的作品，推进理论研究，指引实务操作。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斌雄教授的《扎紧制度的笼子》一书揭示了党内法规制度的三个维度，并且展现了这三个维度下的具体研究思路，对党内法规制度研究具有典范意义。

一是历史维度。党内法规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我们党的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形成的，是我们党把握建党管党治党之历史规律的智慧结晶。诚如斌雄教授在书中指出：“考察以党章为中心

线索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意义上，对如何历史地研究党内法规制度，斌雄教授刻画典范，即客观地素描党内法规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样态，揭示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提供可行建议。

二是政治维度。“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政治性是党内法规制度的首要特征，尽管它具有规范性特征，甚至是法律特征，但其政治属性必然强于其规范属性。在目的论层面，党内法规制度是执政党层层落实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各项主张和政策，确保、实现并巩固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如何“政治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党内法规

制度，斌雄教授笔锋精妙，着意“重点把砥砺奋进的五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发展讲清楚、讲明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思想讲清楚、讲明白，把新时代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总目标、基本内容和重大措施讲清楚、讲明白”。

三是系统维度。党内法规制度是一个规范集合体，就如同法律制度是由内容不同、性质有别和功能相异的一系列规范构成的体系一样，党内法规制度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组织权限规范、行为程序规范、权利救济规范等。如何规范地把握和研究党内法规制度，斌雄教授心得自有，即依照其内容与事务标准，将基础性、主干性的党内法规制度分门别类，推进类型化的精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党内法规制度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本书沿着以形式、内容、功能等维度展开，勾弦提要，